

智慧書

作者：曉鷹

(本文原載於 中國財經報)

今天的中國最短缺的資源是什麼？今天的世界最短缺的資源是什麼？也許有人會說是金錢（好聽點叫“資本”、“資金”），也許有人會說是權力（好聽點叫“秩序”、“制度”）。但本人認為最缺少的卻是智慧！金錢和權力可以改造社會，智慧則只能去認識社會。看上去雙方似乎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但各位是否看到，沒有智慧的金錢與權力正在把我們的社會攪得一塌糊塗、把人心擾得五內不定，又談何“改造”？

書的命運，其實與現今的中國社會風氣一樣。在如今充滿了浮躁、虛榮、矯飾、造作的出版市場中，在那些只求“著書”決不“立說”的專家學者們的產品中，你要想“淘”出幾本有新知有思想有智慧的書，真是難上難！書很多，但好書很少；就像人很多，但人才很少一樣。

所幸的是，我“淘”到了一本“智慧書”，書名叫《“文明衝突”的背後》。之所以稱它為智慧書，一個重要原因是書作者對困擾當代世界的大問題做了極為大膽而又自圓其說的回答。

首先，書中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美國9·11之後三、四年過去了，大張旗鼓地全球反恐卻收效甚微。爆炸、槍擊、濫殺人質事件層出不窮，天天不斷，形影不離。甚至一天、一地出現數起的自殺式爆炸也成了家常便飯式的新聞。恐怖分子越殺越多、恐怖襲擊越打越狠。什麼原因？作者找到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但他並沒有把一切歸罪於它，而是以埃及和伊朗等國為例，說明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必然興起的原因。這些原因恐怕會使我們的讀者大吃一驚：國家在走向現代工商社會時出現的貧富分化與腐敗盛行。

埃及在薩達特總統執政時期，儘管經濟有了發展，但非法致富卻嚴重惡化了社會風氣。書中披露了這樣一種情形：政府要員、銀行和

公營部門的高級職員“仰仗權勢、金錢和關係網，結交權貴和金融家，通過種種不正當手段轉眼成為暴發戶。”1974年至1981年，在短短七年中，百萬富翁增加了90倍。占人口僅10%的富有階層卻佔有了國民收入的58.55%。非法致富的社會效果是：官場貪污的普遍性使例外成為慣例，慣例成為例外。貪污腐化成為慣例，誠實守信反而成了例外。書作者認為，正是這種糟糕的現實使追求社會平等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得到普遍的共鳴並得到社會中下層公眾的真心擁護。

在伊朗，導致1979年霍梅尼“革命”獲得成功的原因是巴列維國王的現代化野心：從1963年至1972年伊朗GDP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1.5%，可與世界任何經濟奇跡相媲美。然而當巴列維在日夜作著恢復“波斯帝國”的迷夢時，卻忘記了一個事實：“經濟在持續發展，社會在持續分化”。僅占全國人口1%的皇親國戚、官僚、大企業主卻佔有全國80%的財富。國王的專機上竟有一個用1億美元裝飾過的金廁所！這時候，遠在國外的霍梅尼發出了教令：被剝削者必須造反。支持霍梅尼的“城市無產者多是從農村流入城市的無技術專長的窮人，他們是現代化中受歧視的城市邊緣人，他們又是狂熱的穆斯林。”基辛格等人後來在總結巴列維失敗的教訓時曾這樣寫道：當時“許多西方經濟學家認為，而伊朗國王也就相信，政府只要提高生活水平，就能得到人民的贊許。換句話說，經濟發展本身就有助於政治穩定。事實證明，這個理論是個災難性的錯誤。”

書作者在詳述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興起的背景後，自然要把筆鋒轉向美國學者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的理論。作者認為，亨氏所謂的基督教與儒教與伊斯蘭教必然衝突的結論掩蓋了一種根本性的衝突，那就是“少數人暴富、巨富還是多數人共同富裕的衝突；是優待資本、虐待勞工與追求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之理想社會的衝突；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重蹈舊路走不通，還是另闢蹊徑，超越資本主義道路的衝突。”書作者用十分激烈的語言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原教旨主義復興。犯罪猖獗，恐怖襲擊。只要繁榮‘娼’盛，一定雞犬不寧。”在這個單極

化世界裏，在美國認為自己的一切都是各國必須遵從的準則的世界秩序裏，原教旨主義也必然會把一切罪惡歸咎於美國，把仇恨集中於美國了。

應該說明的是，本人並不完全同意該書作者的上述觀點，特別是關於“超越資本主義”的觀點與列寧曾經批判的俄國民粹派的觀點有相似之處，無法苟同。而在貧富兩極分化中去尋找恐怖主義的本源，也似乎顯得過於簡單。但是，必須指出，書作者的確是在通過自己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大量研究後，試圖從一個側面去揭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中必然遇到的社會難題。甚至可以說這是一種世界性難題。這個難題就是：現代化必須發展市場經濟，只要發展市場經濟就會有一部分人富起來一部分城市率先實現現代化。但是，承認這一點並不等於放棄對人類公平社會的理想的追求。被稱為西方智者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過：“沒有相當程度的個人自由和社會正義，人類的社會生活是不可能的。”就連占盡了世界便宜的金融巨鱷索羅斯也承認：“市場是非道德的，……然而，社會不能在善惡不分的情況之下運作。”

認真讀完全書後，筆者發現該書作者的理論基點其實只有兩個。第一個是用來分析宗教的；第二個是來解剖現代社會矛盾的。前者是馬克思的一段話：“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後者用的是毛澤東的一個論斷：“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接著作者就大膽斷言：“是維護、鞏固、強化少數暴發戶的既得利益，還是執政為民，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永遠是歷史前進中最根本的大是大非。”

真是一本“智慧書”，它的智慧源泉是什麼？

該書作者是經濟學家王小強先生。“文革”中曾在中國農村插過隊，後在英國劍橋大學獲政治與經濟系博士學位。